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12

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基于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考察

贺正楚,李玉洁,任宇新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跃迁。回顾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每一次跃迁都是从“旧质”到“新质”,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进入新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催生出新质生产力,生产力再次实现跃迁。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中国生产力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因此,有必要基于1949年以来新中国经济发展,回顾生产力发展进程,总结生产力跃迁经验。通过对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进程进行总结和回顾,分析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评估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识别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据此为现阶段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逻辑演变;发展进程;发展成效评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094-10

一 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进入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迎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崛起,它们正在催生全新的生产力形态,推动生产力结构经历又一次深刻变革^①。这一变革不仅体现生产力的飞跃,也深刻反映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模式的创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伴随着生产力结构不断变革,我国生产力发展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跃进,从单一闭塞到多元开放演变,深刻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和变革^②。同时,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相关研究也在不断进行深入和拓展,已经形成多元化、深入化格局,涵盖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以及生产力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等多个维度和层面。(1)关

于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和创造过程中,展现出对自然资源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紧密协作,创造出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③。生产力的内涵不限于静态的能力,更包括动态的、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而对生产力的外延,学界存在多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生产力的外延应包括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④。另一些学者则更侧重于从生产力的物质形态出发,认为生产力的外延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组织等方面^⑤。(2)关于生产力的创新驱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涉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多个层面。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JL121)

作者简介:贺正楚(1968—),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创新管理研究。

①周文,何雨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4期。

②骆前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基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5期。

③王朝科:《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考察》,《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④任宇新,吴艳,伍喆:《金融集聚、产学研合作与新质生产力》,《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3期。

⑤周德海:《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①,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是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②。还有学者则进一步关注创新驱动生产力的路径和机制,从多个角度对创新驱动生产力进行深入探讨^③。(3)关于生产力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生产力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标志着传统生产模式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迈进。这一转型过程不仅深刻改变了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大量研究探讨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④。在智能化转型方面,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智能化转型对产业的影响,认为借助智能化转型,产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洞察市场需求,增强其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⑤。

综上,当前关于生产力的研究已经形成多元化、深入化格局,涵盖多个维度和层面。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生产力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新时代,面对生产力发展新要求,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1949年以来新中国经济发展,系统地对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进程进行总结和回顾,清晰直观地展现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成就,明晰中国生产力所处历史方位,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生产力体系建设、坚定沿着新时代开创的中国生产力发展之路继续前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⑥。因此,本文拟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全面回顾中国生产力的实践进程。目前,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生产力发展脉络的文献尚不多见,而新中国在生产力提升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和进步,可为新时代生产力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和重要指导。二是定量评估中国生产力发展成效。现有研究文献大多从定性角度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分析,本文则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遵循“让事实说话、让

数据说话”的原则,通过原始数据清晰直观地展示中国生产力发展成效,从而为现有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三是实证分析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展望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存在的短板与挑战,对新时代如何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路径探索。

二 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 生产力的概念及其演进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先是提出狭义生产力概念,后又提出劳动生产力概念。其中,狭义生产力概念强调生产力即为生产资料,与社会关系具有密切联系,不同生产资料对应不同的社会关系,代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劳动生产力概念主要阐释生产力在劳动过程中的动态特性,并将其细分为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自然生产力聚焦于历史因素,指出劳动生产力是从历史中继承而来,并受到特定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而社会生产力则更为注重社会因素,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还受到工人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应用水平、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都是在继承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结合各自时代特色,实现新的生产力进步。

正是基于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生产力概念也在不断演进。毛泽东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结合历史经验和当时所处发展阶段提出“科技生产力”概念,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江泽民提出“先

①俞立平,张矿伟,吴功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1期。

②尹木子:《“预聘—长聘”制度会提升中国大学科研生产力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政策评估》,《高教探索》2020年第6期。

③焦方义,张东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④郭栋,尤帅,刘云:《数字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动力机制、关键主体及提升路径》,《社会科学家》2024年4月25日(网络首发)。

⑤李廉水,石喜爱,刘军:《中国制造业40年:智能化进程与展望》,《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1期。

⑥刘美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表达》,《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进生产力”概念,强调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把它放在“三个代表”的首位。胡锦涛进一步提出“物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等概念,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全局出发,分别从物质、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全面考虑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即新质态、高质量的生产力,是由高新技术驱动,依托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生产力,具有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①。新质生产力反映了新时代生产力由“量”到“质”,由“旧”到“新”,由“低”到“高”的跃迁规律,为新时代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供了新思路。

(二) 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特征

生产力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使得生产力不断从旧质到新质,从低级到高级进行迭代跃迁,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②。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摸索和探索到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和深入发展,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发展,我国生产力呈现出根据时代特征不断演进的特点。因此,此部分将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对中国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演进及特征进行总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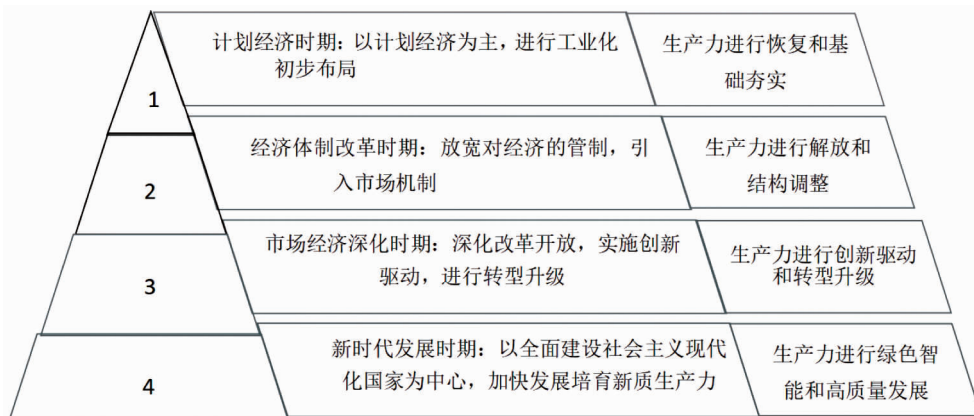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演进及特征

1. 计划经济时期: 生产力恢复与基础夯实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生产力的演进显著体现在经济恢复与基础建设双重任务上。一方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领导人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措施,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础建设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注重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在工业领域,重点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产业,对工业化发展进行初步布局。此外,通过加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但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使中国生产力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生产力解放与结构调整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生产力解放和结构调整成为中国生产力演变的两个核心特点。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成为改革的起点;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通过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在产业方面,为遵循市场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政府提出

^①杜传忠,李钰葳:《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张忠良:《我国现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层次性、阶段性与党的“三个代表”作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政策,鼓励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努力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在区域方面,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差距,政府提出实施区域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努力加强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同时,为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政府提出实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努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效益,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演进升级。

3. 市场经济深化时期:生产力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

在市场经济深化的大背景下,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生产力演进的两大核心趋势。一方面,创新驱动已成为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创新驱动战略,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为生产力提升注入不竭动力。同时,政府还高度重视人才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培养和引进高素质创新人才,优化人才结构,为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另一方面,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走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中国,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此,中国政府分别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合作、加强企业数字化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措施^①,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帮助企业进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 新时代发展时期:生产力绿色智能和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绿色智能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新需求,提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理论和战略,为新时代如何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首先,提出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整体

改善”理论,通过生产力总体跃升和整体改善,科学部署我国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和经济增长效益实现我国生产力总体跃升^②。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新动能、创造新优势和增强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生产力总体改善^③。其次,倡导绿色生产力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绿色智能化在提升生产力中的作用,倡导通过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推动生产流程向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和绿色化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生产力发展理念突破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的新质化。最后,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为新时代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供了新思路。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型生产要素在不断涌现,生产力发展必须要实现由“旧”到“新”,由“量”到“质”,由“低”到“高”的跃迁,通过实现生产力各要素“新”“质”“高”的发展推动生产力水平总体跃迁,从而在全要素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现代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④。

三 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演变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演变逻辑主要体现为从增长导向到质量导向的发展理念转变、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创新、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化产业的发展结构升级、从外部驱动到内生驱动的发展动力转换以及从经济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目标提升。这些变迁逻辑共同推动我国生产力在“新”和“旧”,“量”和“质”,以及“高”和“低”等方面的扬弃,实现生产力水平总体跃迁和全面提升。具体逻辑演变关系见图2。

^①潘为华,贺正楚,潘红玉:《习近平关于产业链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②刘友金,冀有幸:《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当拼在数字经济新赛道》,《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③张乐:《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

^④盛毅:《中国式产业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战略选择》,《经济体制改革》2023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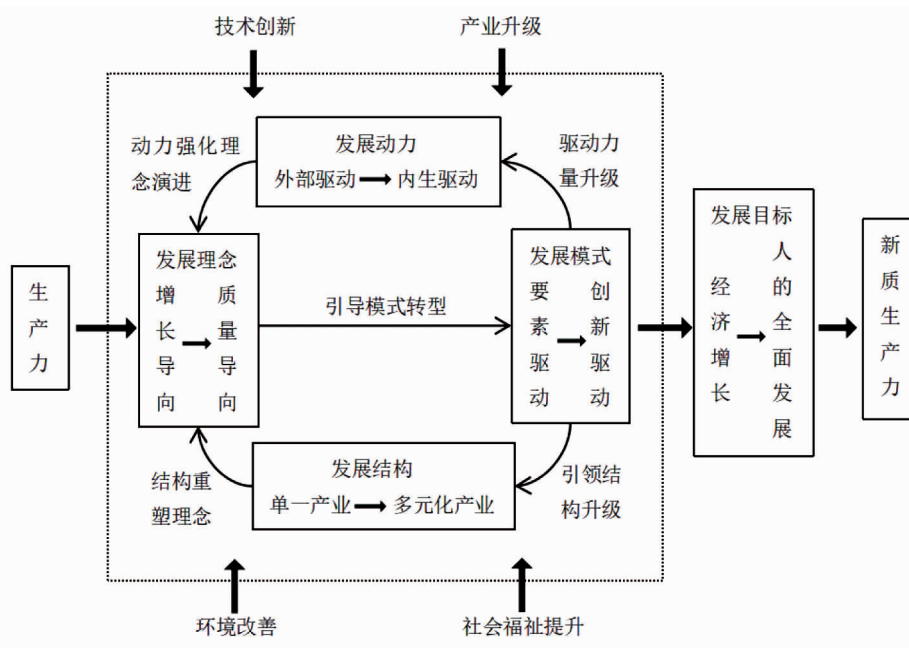


图2 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演变

1. 生产力发展理念的演进:从增长导向到质量导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GDP和人均GDP均处于极低水平,工业基础亟待加强。为迅速恢复经济,我国以经济增长为导向,通过集中资源、加大投资、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等措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增长导向的发展理念逐渐显露出局限性。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给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因此,我国生产力发展理念开始发生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开始以质量为导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努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增长点。从增长导向到质量导向的演进,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总量上,更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上,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创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历程中,发展模式正在经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调整,也是新

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更是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下,中国主动适应并引领发展潮流的明智选择。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然而,这种传统模式虽然能够迅速扩大经济总量,但也带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为此,中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等举措,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努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并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以5G技术为例,中国不仅在网络建设方面取得全球领先优势,还在设备制造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竞争力。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环保技术创新。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挑战,中国加大在新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的投入力度,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水平,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实现生产力的新质跃迁奠定坚实基础。

3. 生产力发展结构的升级:从单一产业转向多元化产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农业和重工业。这种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旨在迅速恢复经济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产业结

构使得重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其局限性逐渐凸显。改革开放后,中国意识到产业结构单一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升级发展。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工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比重显著上升,高技术制造业和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增长势头强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①。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产业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还有效加速生产力的跃迁,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4. 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转换:从外部驱动到内生驱动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扶持和外资引入等外部因素曾在特定阶段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进入新时代,为适应新发展要求,必须要实现生产力从外部驱动到内生驱动转变。过去,政策扶持和外资引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国内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驱动的发展模式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要实现生产力的长期稳定发展,关键还在于激发内部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因此,为培养和激发内生驱动因素,我国进行相应调整,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使我国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能力得到显著加强。

5. 生产力发展目标的提升:从经济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目标经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全面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调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入实践,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思考。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摆脱贫困和落后,我国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集中资源推动经济建设。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逐渐

认识到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基于此,中国领导层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并实施一系列相应措施。在教育领域,持续加大投入,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质量;在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文化领域,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提升国民素质、保障人民健康和丰富精神生活来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成效评估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生产力取得怎样的成效,发展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特点,需要深入进行分析。由于生产力三要素的发展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力发展变化,因此可选取劳动者素质水平、劳动资料效能和新型劳动对象使用情况来评估生产力的发展成效和发展特点^②。

(一) 劳动者素质水平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具有时代特征。其素质水平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很好地体现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水平^③。所以,本文选取劳动者素质水平来评估生产力的发展成效。

本文以单位就业人员产出代表劳动者素质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收集整理1978—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总数数据,并据此绘制出单位就业人员产出的变化趋势图(见图3)。通过观察图3可以发现,总体来看,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劳动者素质水平整体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单位就业人员产出从1978年的916元上涨到2022年的164988元,44年间增长了180倍。此外,为观察中国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速变化情况,将1978年至2022年这44年按大致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对应20世纪80年代、20

①贺正楚,李玉洁,吴艳:《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科学学研究》2024年第3期。

②数据来源:此章节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③林龙飞,祝仲坤:《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中国劳动供给紧张吗?》,《经济体制改革》2024年第1期。

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十年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并据此绘制出中国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速变化图(见图4)。通过图4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速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劳动者素质水平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速却呈现下降趋势。1978—1989年间劳动者素质水平从916元上涨到3105元,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长3.4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10.71%。1990—1999年间,劳动者素质水平从2915元上涨到12685元,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长4.4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15.84%;2000—2009年间,劳动者素质水平从13911元上涨到45962元,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长3.3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12.69%;2010—2022年间,劳动者素质水平从54151元上涨到164989元,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长3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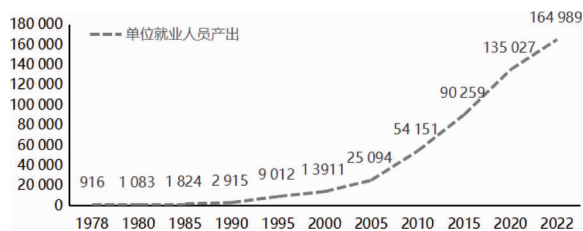


图3 各年度劳动者素质水平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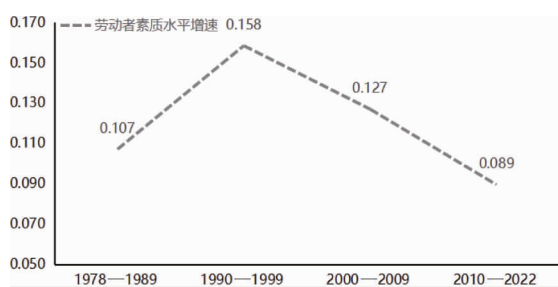


图4 分阶段劳动者素质水平增速图

(二) 劳动资料效能

马克思指出,不同劳动资料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方式可以反映不同的经济时代。劳动资料介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代表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又由一定的材料构成,决定劳动对象及产品的质量^①。因此,本文选取劳动

资料效能评估生产力的发展成效。

以单位电力产出产值代表劳动资料效能,用国内生产总值与电力消费总额的比值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收集整理1980—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电力消费总额数据,并绘制出中国单位电力产出产值变化趋势图(见图5)。通过观察图5可以发现,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在不断提升。单位电力产出产值从1980年的1.526元上涨到2021年的13.489元,41年间增长9倍左右。此外,为观察中国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速变化,将1980年至2021年这41年按大致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对应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十年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并据此绘制出中国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速变化图(见图6)。通过观察图6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速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劳动资料效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但整体增速保持平稳。其中,1980—1989年间劳动资料效能水平从1.526元上涨到2.929元,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长2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6.73%。1990—1999年间,劳动资料效能水平从3.029元上涨到7.360元,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长2.5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9.28%;2000—2009年间,劳动资料效能水平从7.444元上涨到9.411元,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长1.3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2.37%;2010—2021年间,劳动资料效能水平从9.828元上涨到13.489元,劳动资料效能水平增长1.4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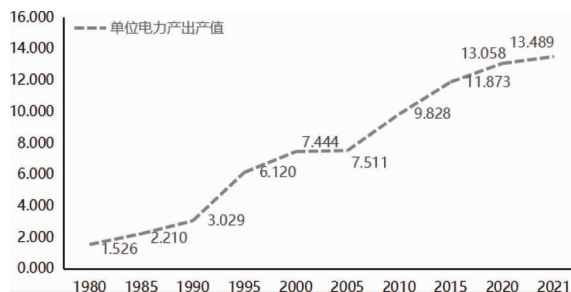


图5 各年度劳动资料效能变化趋势图

^①何爱平,徐艳:《劳动资料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经济纵横》2021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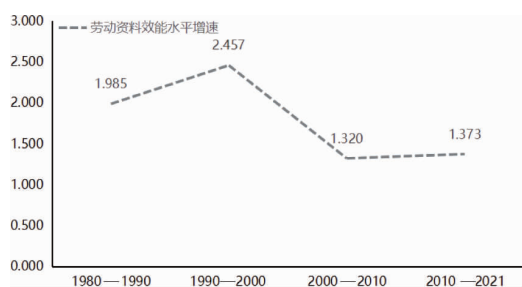


图 6 分阶段劳动资料效能增速变化图

(三) 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

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演变能够直观反映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特别是其中的材料革命,能够引起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①。所以,新型劳动对象的广泛使用能够很好地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选取新型劳动对象评估生产力的发展成效。

以重要化工产品——化学纤维作为例子研究中国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情况,用化学纤维产量代表当年对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本文收集并整理了 1978—2021 年化学纤维的产量数据,并据此绘制出新型劳动对象使用情况的变化趋势图(见图 7)。通过观察图 7 可以发现,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在不断提升。此外,为观察中国新型劳动对象使用的增速变化,将 1978 年至 2021 年这 43 年按大致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对应 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和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并据此绘制出中国新型劳动对象使用的增速变化图(见图 8)。通过观察图 8 可以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国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速维持在稳定状态,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一直保持稳步增长。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速呈现略微增长趋势,但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我国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其中,1978—1989 年间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从 28.46 万吨上涨到 148.09 万吨,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长 5 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 14.73%。1990—1999 年间,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从 165.42 万吨上涨到 600 万吨,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长 3.6 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 13.75%。2000—2009 年

间,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从 694 万吨上涨到 2 747.28 万吨,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长 4 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 14.75%。2010—2021 年间,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从 3 090 万吨上涨到 6 708.47 万吨,新型劳动对象发展水平增长 2 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为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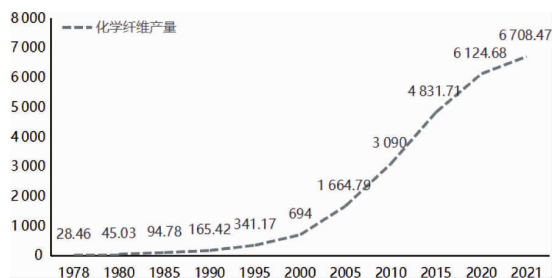


图 7 各年度新型劳动对象使用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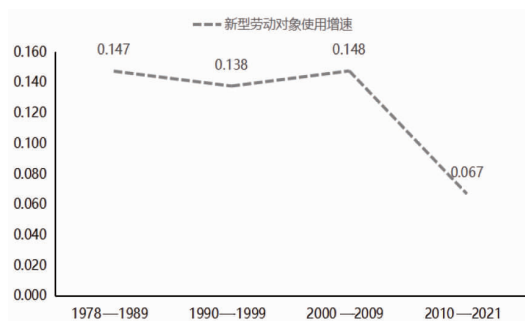


图 8 分阶段新型劳动对象使用增速变化图

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由多种情况决定,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劳动生产力的上述内容均需要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事业的进步。因此,需要从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两个方面进一步对生产力发展进行研究。

(一) 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劳动者素质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即为接受教育。一方面,教育不仅可以把过去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进行传承,而且可以将最新的科学技术等信息进行快速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观察、分析和创造等综合能力。因此,教育是生产力发展的保障因素,能够推动生

^①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

产力水平的提升。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教育事业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代表教育发展水平,其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用教育经费支出与在校学生数的比值来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收集整理1992—2021年中国教育经费支出、在校学生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据此绘制出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图(见图9)。通过观察图9可以发现,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较为相近的增长趋势。1992—2021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434元涨到21597元,增长近50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34元涨到81370元,增长近3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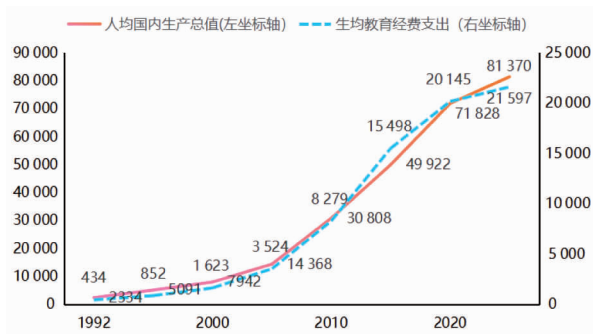


图9 变化趋势图

进一步的,为研究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情况,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将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作为自变量进行基础回归。通过基础回归可以发现,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每上升1%,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能上升3.37%。由此可知,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二)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其不仅能够扩大和提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形态,促进生产资料的变革^①,而且能够很好地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深入分析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R&D支出来代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根

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模型的需要,本文收集整理1995—2022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据此绘制出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图(见图11)。通过观察图11可以发现,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较为相近的增长趋势:1995—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348.7亿元涨到30782.9亿元,增长88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091元涨到85698元。

进一步的,为研究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情况,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将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作为自变量进行基础回归。通过基础回归可以发现,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每上升1%,生产力发展水平就能上升2.762%。由此可知,科学技术能够显著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

六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展望

分析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无论是劳动者素质、生产资料效能还是新型劳动对象的使用均得到很大的提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力发展增速加快尤其明显。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增速出现下降趋势。可能原因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阻碍也变得越来越大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增速。加之经过前期的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进入瓶颈期,需要科技创新推动实现由量到质的跃迁。基于此,进入新时代,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科技环境,我国必须加快形成和积累以数字化为中心的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②。

第一,要注重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通过从总体上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水平来提升生产力水平。为快速适应数智化时代发展需要,必须加

^①杨春学,李昊匡,张伊娜,等:《技术创新与生产关系变革——兼论四次产业革命的冲击与调整》,《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简新华,聂长飞:《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快培育一批高质量、高层次的数智化人才。一方面,中国最重要的人才输出方式之一是高等教育,因此,高校要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加大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加快形成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为中心的学科教育体系,为新时代国家生产力发展培养主力军。高校还要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为生产力发展培养一批懂理论、懂操作的实干型、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国家要出台相应的福利政策,加大力度引进国外高端数智化人才,加快推进国内外科研团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第二,要注重新型生产要素的培育和发展,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提供要素保障。要素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物质前提,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时代发展的特征,大力进行要素革命,发展和培育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和发展相关产业,优化数据服务产业结构,提高数据服务产业的服务质量,为提高数据资源处理能力、管理水平、开放能

力提供保障,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加完整贯通的数据链条。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市场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数据市场定价和开发机制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行数据交易和开发,提升数据等要素的发展潜力。

第三,要注重教育事业和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教育和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换言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下进行生产力发展竞争,某种程度上就是教育和科技创新竞争。教育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的根本和保障,因此要对教育和科技创新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政府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研发机构,鼓励高校和企业进行联合创新研发,鼓励高校和企业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化协同研发、市场化运作管理的新型创新生态系统,从而推动教育和科技创新事业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From Productivity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China

HE Zhengchu, LI Yujie & REN Yuxin

(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Productivity is a historical and dynamic concept that will evol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we can see that every transition is from “old quality” to “new quality”,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low level” to “high level”.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new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data and computing power have spawne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ity has realized a leap agai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China’s productivit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evolution from productivity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since 1949,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oductivity and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productivity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China’s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evaluates the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dentifi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current stag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ogical evolu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fluence factor

(责任校对 徐宁)